

新中国70年军民融合思想演进与实践轨迹

谢地^{a,b} 荣莹^a

(辽宁大学 a.经济学院; b.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 沈阳 110136)

摘要:军民融合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重要表征之一。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回顾党的军民融合思想演进过程和实践发展,对于深刻理解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发展道路,探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与强军梦的衔接路径,努力在军民融合中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强军目标,无疑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重大现实意义。中国特色的军民融合思想主要源于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其发展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军民融合思想已经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将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中国特色发展道路;军民融合;国防建设;经济建设;新中国70年

中图分类号:F0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9)06-0010-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国防、军队和经济建设过程中,始终致力于探索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道路。毛泽东明确提出“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以军为主、寓军于民”的重要思想,可谓军民融合理论与实践的1.0版本;邓小平明确提出国防工业必须坚持“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十六字方针,代表军民融合思想与实践的2.0版本;江泽民强调国防建设必须随经济建设发展得到加强,做到“两头兼顾、相互促进”,提出“军民结合、寓军于民、大力协同、自主创新”的重要思想,可以称之为军民融合的3.0版本;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建立和完善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完善军队人才培养体系和军队保障体系,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可谓军民融合的4.0版本;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强调,要“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努力开创强军兴军新局面”,首次将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意味着军民融合5.0版的诞生。从“军民结合”到“寓军于民”,再到“军民融合”,这些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军民融合发展道路。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对这些思想进行结合时代特征的认真梳理,总结实践轨迹,对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一、军民融合的内涵、外延及当代价值

军民融合发展是指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相互支撑、相互补充、互利共赢、融合发展,有两层含义:一是“军转民”,军事技术民用化,广泛用于支持民用企业发展;二是“民参军”,民用企业参与军工市场,民用技术支持军事工业发展。理解军民融合要界定几个相似的概念。军民融合不同于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标准经济学学科体系建构与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18ZDA036)

作者简介:谢地,1963年生,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荣莹,1994年生,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军民复合,军民复合是两者简单而非有机聚合在一起;军民融合不等于军民一体,军民一体强调两者已形成密切联系的一个整体;军民融合不等于军民兼容,军民兼容强调的是同时容纳两个不同的方面;军民融合也不等于军民两用,军民两用强调的是对两者都有用处;军民融合也不等同于军民结合,军民结合是军与民由分立情形建立联系的状态。军民融合核心在“融”,更强调军用与民用,国防同经济、科技有机结合为一个整体,树立“一盘棋”思想,形成“强军”与“强国”过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融状态。

军民融合发展的战略目标是要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丰富融合形式,拓展融合范围,提升融合层次。军民融合的发展定位是促进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呈现整体推进、加快发展的良好态势,使军民融合的领域和范围不断拓展。军民融合的战略价值是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有利于增强国家战争潜力和国防实力。军民融合的基本原则是“四个强化”,即强化大局意识,强化改革创新,强化战略规划,强化法治保障。军民融合的主要任务是要在国家层面加强统筹协调,推动国防科技工业、武器装备、人才培养、军队保障社会化、国防动员等领域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更好地把国防和军队建设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体系。

军民融合的基本途径是以需求为牵引,以问题为导向,以改革为突破口,加强宏观调控和资源统筹,加强军民协调配合,既强化国家主导作用,又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打破军民二元分离结构。具体地主要是:第一,军用、民用技术互动。军民融合的实现除了要求军工单位要有较强的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能力外,还要求以该相关性技术为背景开发的民品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有实现规模经济的潜力。为了达到这一要求,以更好地促进军民融合,要加大对军民两用高新技术开发与产业化资金的扶持力度,逐步提高对军民两用高新技术开发经费的支持力度,完善军民两用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的风险投资体制,鼓励民用产业企业技术和产品服务于国防事业。军工企业要探索建立军民两用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主体多元

化、融资渠道多样化的路径,建立军用技术转民或者民用技术转军时的原开发主体和现使用主体之间的利益共享原则和路径。第二,改革完善体制机制。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发展道路,要打破军民融合发展面临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加强军民结合体系、寓军于民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军队人才培养体系、军队保障和国防动员体系等四大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决策机制、竞争机制、成果转化机制、经费保障机制、补偿机制和监督与问责机制等,以避免因决策失误造成资源浪费;通过竞争提高效益;打破军用与民用壁垒,使技术成果在更大范围内转化为经济和社会效益。第三,改进与优化管理模式。建立适应国防建设和市场经济要求的国防科技工业管理体制,打破行业垄断、部门垄断、行政性进入壁垒,最终建立起政府调控有力、公共服务完善、企业竞争有序、军民互动良好的国防科技工业管理模式。既要完善由中央统一领导的国防建设管理体制,设立统管军民融合的专门机构,又要依靠各级政府和军队管理部门合力推进,形成一个统筹在高层、落实在基层、各级政府分级分权的军民融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直面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和国际竞争态势,军民融合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首先,军民融合是自主创新,提供技术进步新引擎,也是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迫切需要。2015年,习近平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是更加激烈的科技竞争,如果科技创新搞不上去,发展动力就不可能实现转换,我们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就会处于下风。”2018年5月28日,在中国科学院第19次院士大会上,习近平强调,“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再次提出必须牢记技术是核心战斗力,尽管中国正努力克服其在国防科技方面的不足,但要赶超发达国家技术水平,仍然需要军民融合,“产学研”科研机构的共同助力,实现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的双向流动、融合与进步。

其次,军民融合是推动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发展的现实需要。2016年5月,国防金融研究会成立大会强调部队的预算受限,“面对国防投入刚性需求增加和国家财政收支矛盾加剧的现实,单单依靠国家的财政性国防投入,已经不足以支撑国防和军队建设实现超常规发展”。新时代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2018年财政赤字高达37554亿元,全年GDP增速6.6%,较2017年降低0.3个百分点,经济增长放缓,与此同时2018年中国国防支出增长仅8.1%,意味着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两位数增长不复存在,但军费支出仍不断扩大,突破了一万亿。因此,以牺牲经济发展增加国防支出来实现国防现代化目标会产生巨大的“挤出效应”。军民融合不啻是化解这一矛盾的重要手段。最后,军民融合是提高我国军事战争实力的重要途径。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美国遏制中国战略昭然若揭的背景下,要成功规避“修昔底德陷阱”必须建立强大的国家安全系统,特别是要把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军事现代化有机结合起来。事实上,主要军事大国军用设备中80%以上的技术都是军民通用的。军用技术的民用化、民用技术军用化、军民兼用技术的发展为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牵引力,而产业技术又为军事技术进步提供了丰厚的土壤。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民用技术研发能力不断提升,通过军民融合可以助推民用技术迅速为军工领域吸收并应用,还可以将适用军工技术转为民用技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二、改革开放前的军民融合思想及其实践(1949—1976)

中国特色军民融合的源头最早要追溯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42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我们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或叫‘军民兼顾’”^{[1]894-895},第一次提出“军民兼顾”的思想。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人民战

争”“人民的军队”“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战略战术”等概念,并作了精辟阐述。“人民战争”本质来说是军民融合的理论核心。一方面,战争时期,有了人民群众,就会无往而不胜,“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2]340};另一方面,和平时期转变为人民国防思想,国防要发挥带动与协调经济发展作用,实现最广大人民的现实利益与根本利益。国防与经济“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立,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2]769}。虽然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军民融合思想已开始萌芽,但是由于当时军事与经济二元分离的结构状态,军民融合缺乏进行具体实践的基础条件。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我国国防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逐步建立,军民融合才进入系统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相结合的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前,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军民融合思想及其实践经历了以下四个时期。

(一)“一手抓经济,一手抓军事”时期(1949—1950)

面临新中国“一穷二白”窘困局面,毛泽东提出一手抓国防建设,建立强大的国防军;一手抓经济建设,争取国家财政状况基本好转的“两手抓”方针。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3]532},要求军队和社会全体民众共同推进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打破军队与社会之间封闭状态。1949年12月,中央军委指出“军队在和平时期,在不妨碍军事任务的条件下,应有计划地参加农业和工业的生产,帮助国家的建设工作……使我国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人民解放军加生产,不是临时的,应从长期建设的观点出发”^{[4]367}。人民解放军被定义的双重身份,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是军民融合“军转民”的初级阶段。

(二)“进入全面作战准备”时期(1950—1953)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意味着仅实施一年多的国防工业和民用工业统筹发展的方针不得不暂时搁置,全国进入作战准备阶段。中央对

国防工业管理机构进行改组,成立中央军委兵工委员会、第二机械工业部等部门作为管理国防工业的专门机构,极大地提高了运行效率,保障了朝鲜战争之急需。社会经济建设全面服务于军队,期间国防军费占国家财政支出比例高达32%~43%,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极大的“挤出效应”。

(三)“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以军为主,寓军于民”时期(1953—1960)

抗美援朝结束后,我国从“一五”计划时期开始积极探索以国防工业项目带动民用项目,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新尝试。1956年1月,毛泽东对国防工业生产提出了要求“国防工业在生产上要注意军民两用,注意学会军用和民用两套生产技术,要有两套设备,平时为民用生产,一旦有事,就可把民用生产转化为军用生产”^{[3]86-87}。国防工业的双重生产身份要求其在军用生产与民用生产之间根据社会形势不断切换。紧接着,国家计委会同军工生产部门制定了《关于在和平时期发挥国防科技工业的生产能力,组织生产民用产品的办法》,对国防科技工业生产民用产品的具体实施细则进行了详细的阐述。1956年2月,毛泽东提出“在军事工业中练习民用产品的本事,在民用工业中练习军事产品的本事的办法是好的,必须如此做”^{[5]306},强调除了军事工业民产化,同样可以进行民用工业军产化,这也称之为是“民参军”的首次尝试。1956年4月,毛泽东所在《论十大关系》中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进行了简明扼要的阐释,“国防不可不有”,“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加强经济建设,“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6]27-28}。应当说,这种以经济建设为前提,国防建设为目的,实现富国与强军双赢的政策效果是十分显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防费占财政支出比例下降到20%~34%,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降至10%~20%^[7],军工企业民用品产值占总产值高达60.8%。1957年3月,第二机械工业部制定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以军为主,寓军于民”的国防工业“十六字方针”发展模式,要求国防工业在完成军用产品生产任务前提下主动参

与民用产品生产,民用工业在国防需要时以生产军用品为主,鼓励开发军民两用技术。

(四)“搞好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1960—1976)

20世纪60年代,在美苏冷战进入白热化,中苏关系紧张,越南战争爆发、台海局势恶化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做出“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预判,确立国防优先的发展战略,进入“以军为主”军事预防阶段,经历两次扩编的解放军规模一度赶超美苏两国兵力之和。党中央于1964年做出“搞好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要求三线地区要搞工业基地建设,一、二线地区也要搞一点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军事工业。“三线建设”在为军队后方提供强大支撑力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国家生产力布局,但投资巨大、损失浪费严重,损害了东部地区的持续发展能力。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扰乱了“军民结合”方针,国防科技工业的民品生产一度被认为是“不务正业”。

改革开放前的军民融合发展成就巨大,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国防给脆弱的经济带来巨大压力的同时,研发出的“两弹一星”等一系列高精尖国防技术装备,打破了美国、苏联的“核讹诈”,巩固了国防安全。“三线建设”推动了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为改革开放后的大规模军转民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囿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形成并固化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分割管理的体制机制,不利于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有机融合,不利于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

三、改革开放初期的军民融合思想及其实践(1978—1993)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以军养民”“军品优先”的战略思想,并以“军转民”为切入点对军民融合进一步探索,其间经历了“初创先试、实践引导、探索融合”三个阶段。

(一)“国防建设必须服从经济建设”的“初创先试”时期(1978—1982)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客观分析两极争霸转化为多极化发展的国际形势,提出

“过去我们过多地认为世界大战很快就要打起来了,忽视经济建设。现在根据新的观察、新的分析,下决心一心一意搞建设”^{[8]249-250},他认为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8]105}，“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实现现代化,只有在国民经济有了较好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8]128}、“要重视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必须服从经济建设,不然国防建设也是空的”^{[9]195}。据此,政策采取的是国防建设全面服务经济建设,助推农业、工业与科技现代化实现,在此基础上,改善武器装备生产技术实现国防现代化。当时军工部门生产步履维艰,“三线”军工产业一度停滞,1978年,军工系统民品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不到8%,不得不进行“军转民”改革。但由于缺乏顶层设计,当时的“军转民”也具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性质,军工企业陷入“看什么畅销就生产什么”,自行车、电冰箱、洗衣机、大客车等许多民品生产都曾纳入其生产领域,军工企业的技术优势没有得到很好发挥。

(二)“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军养民”的“实践引导”时期(1982—1986)

军工企业进退维谷的境地引起国家领导层的重视,邓小平提出搞电冰箱洗衣机没有带动国家经济进步,重点是要发挥军工技术设备和人才优势。1982年,船舶工业率先进行领导体制改革,转变政府部门为经济实体,试行“军民结合”、工贸结合、造修结合、科研生产结合的体制。1986—1988年,各工业部相继进行改革,最终形成了以归国务院直接领导的航空航天工业部和机械电子工业部两大部委,以及由能源部归口管理的核工业总公司,由航空航天工业部归口管理的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由机械电子工业部归口管理的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北方工业总公司等组成的五大军工集团公司。这一改革对军工技术与民用生产之间横向联合起到积极促进作用。1982年,邓小平提出“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军养民”十六字方针,要求军工企业只需保证军工产品的基础生产,其余的技术与力量应全面投入到民用产品生产。1983年8月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防科工委联合召开“军

民结合,发展民品”工作会议,对军工企业生产民品计划进行了具体安排。同年9月,国务院召开研究军转民问题会议指出,军工企业搞民品生产、技术转让,不是为了找饭吃,是要为国民经济服务,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方针。1984年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邓小平正式提出“军民合用”“军地两用”概念,他认为“军队各个方面都和国家建设有关系”^{[8]99}，“无论空军也好,海军也好,国防科工委也好,都应该考虑腾出力量来支援国民经济的发展。如空军,可腾出一些机场,一是搞军民合用,一是搞民用,支援国家发展民航事业。海军的港口,有的可以合用,有的可以腾出来搞民用,以增大国家港口的吞吐能力”^{[8]99}、“国防工业设备好,技术力量雄厚,要充分利用起来,加入到整个国家建设中去,大力发展民用生产。这样做,有百利而无一害”^{[8]98}。

(三)先进技术引领的“探索融合”时期(1986—1993)

邓小平高度重视科技发展问题,认为科学技术不仅仅是马克思曾论述的生产力,而是第一生产力^{[8]274}。在“军转民”进入实施阶段后,邓小平对利用军民两用技术促进国防、经济的协调发展给予高度关注。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10]86-87},认为科学技术是“四个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实现科技现代化是当前最突出问题,需要首先解决,因为“不单是尖端武器、常规武器有科研问题,就是减轻战士身上带的东西的重量,同样有科研问题”^{[11]85}。在邓小平的指示下,1986年《高新技术研究发展规划(863计划)纲要》正式出台并进入实施阶段,在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和海洋技术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国际科技竞争力量全面提升,军工企业民品生产得到飞速发展。到1989年,国防工业企业近七成开始进行民品生产。

改革开放初期,在邓小平的推动下,我国的军民融合在“军转民”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民用核

能、民用航天、民用航空飞机、民用船舶制造等军用技术民品化产业快速发展。近 20 年时间,军队向地方开放 101 个机场、29 个港口码头,支援国家经济建设项目 1000 多个,科技成果社会化转移一万多项,近一半的退役士兵、军队人才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以“军转民”为主要特征的军民融合还是片面的融合,这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指向有关,但在经济发展中实现强军目标同样应该给以高度重视。

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军民融合思想及其实践(1993—2003)

20 世纪 90 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受重创。海湾战争拉开新型信息化军事变革序幕。同时,我国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军民融合的探索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开启的,提出“两头兼顾”“寓军于民”的战略思想,先后经历了从“承前一军转民”转变为“启后一民参军”两个阶段。

(一)“军队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承前一军转民”时期(1993—1999)

苏联解体后,江泽民提出“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变动的历史时期。总的来看,目前国际形势对我国发展是有利的。首先,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判断,是我们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大前提”^{[12]278}。1992 年 10 月,中共十四大上江泽民再次指出“坚持寓军于民,推动国防科技工业走‘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发展道路是正确的”。江泽民充分肯定邓小平的军民融合战略思想,即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防建设服务经济建设的单向“军转民”路径。在坚持这一战略的同时,江泽民深刻认识到 1991 年海湾战争之后更深层次的高技术战争已经悄然到来,新型信息化军事变革刻不容缓。1993 年军委扩大会议上江泽民指出“要把未来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可能发生的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12]285},要求军事工业在量产的

基础上实现质的飞跃,在世界新军事变革中取得战略主动权。在此基础上,1995 年中央军委提出“科技强军”思想,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非常重要的战斗力,“我们要跟上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步伐,最根本的是要贯彻科技强军战略,依靠科技进步加快军队现代化建设,提高军队战斗力”^{[13]591}。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我们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军队建设贯彻‘科技强军’思想,正是适应这一时代要求而做出的正确抉择”^{[14]96}。党的十五大报告继承了邓小平时期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关系的阐释,提出“军队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勤俭建军,积极支持和参加国家经济建设”^{[15]36}。但不同之处是江泽民强调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积极探索科技强军、兴国的转换能力,走出一条适应中国国情并反映时代特征的经济市场化、国防现代化道路。

(二)“经济建设与国防现代化建设两头兼顾、协调发展”的“启后一民参军”时期(1999—2003)

1999 年 5 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袭击了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台独”敌对势力也蠢蠢欲动。江泽民指出“虽然新的世界大战和针对我国的全面战争在较长时间内打不起来,但诱发局部战争、武装冲突和国内局部社会动乱的因素依然存在。虽然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成为国际斗争主导方面,但军事手段依然起重要作用。”^{[12]281}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总体水平再上新台阶,2001 年全国 GDP 总量位居世界第六位^{[13]532},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发展已经赶超国防发展速度,尤其在高科技领域,但部分地区“军转民”过急、过快、过热矛盾已经显现。针对经济与国防的错位发展形势,江泽民明确提出“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特色军事变革强军目标,强调军队进入“机械化任务尚未完成,同时又要向信息化过渡”^{[16]473}的特殊阶段,提出“经济建设与国防现代化建设两头兼顾、协调发展”的方针。2001 年 3 月 15 日,第九届人大四次会议把“坚持军民结合、寓军于民,大力协同,自主创新,建立适

应国防建设和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国防科技工业体制”和“发展军民两用技术”作为“十五”期间我国国防科技工业改革的总要求。2002年12月,江泽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无论是“先军后民”还是“先民后军”,只要能有效推动国防和经济建设,使“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就是正确的。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要“坚持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意味着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强调国防建设的地位和发展速度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为此,江泽民提出,国防工业体制要搞“哑铃型”而不要搞“橄榄型”;“要寓军于民,打破行业、部门界限,突破原有国防工业体制的约束”,“调整人才培养模式”,“建立起三军一体、军民一体的保障体制”等,并出台多项政策支持人才培养与后勤保障社会化问题。例如,1994年成立“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协调经济军事、军队政府等关系以增强军民结合效果;2000年,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建立依托普通高等教育培养军队干部制度的决定》正式确立社会型军队干部培养模式,实现人才培养模式社会化调整的历史性转变;2002年中央军委提出包括饮食保障社会化、医疗保障社会化和职工分流等在内的“七化一改”任务,此后后勤保障社会化改革逐步展开。

在我国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以后,党的军民融合思想致力于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军民融合路径,在“军转民”的基础上推进两头兼顾和军民两用,探索“军转民”与“民参军”互动发展,国防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一方面,诞生了一批军民融合高技术产品和军民两用技术,形成一批拥有军工背景的高科技园区和军民共建的军工产业基地;另一方面,“民参军”热潮高涨,民用企业积极参与国防科技产品生产与研发,成为国防发展新一代主力军。与此同时,在依靠社会力量调整军队人才培养体系、推进军队后勤保障社会化等方面也取得长足进展。但总体上说,军民融合发展还处于初步整合阶段,军民融合还存在较大调整与上升空间。

五、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军民融合思想及其实践(2003—2012)

进入21世纪,我国面临跨越经济发展“中等收入陷阱”挑战与国防建设自主创新“天花板”效应双重压力,进入“既有巨大发展潜力和动力,又有各种困难和风险,既有难得机遇,又有严峻挑战”^{[17]15}的特殊时期。在这一背景下,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军民融合有了进一步的深入思考,提出更广范围、更深程度、更高层次的“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战略思想,其探索经历了“跨越”和“进阶”两个阶段。

(一)“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的“跨越”时期(2003—2009)

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18]119}以后,科学发展观成为包括军民融合在内的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胡锦涛指出,要“通过科学的发展规划和计划把国家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融入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全局之中”^{[19]18}。2005年胡锦涛又提出“要依托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把国防建设融入现代化建设全局之中,统筹国防资源与经济资源,注重国防经济和社会经济、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军队人才和地方人才的兼容发展,进一步形成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19]3}。2007年9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建立和完善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军队人才培养体系和军队保障体系,坚持勤俭建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这是在继承前代领导人关于国防和经济建设思想成果基础上,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与国际安全形势等时代特征对经济与国防发展做出的核心判断。报告还指出:“要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坚持军民融合式发展,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20]41}这意味着新世纪、新阶段以后,我国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已经不再存在先后发展与主次服务之分,富国与强军应该是同时进行的,两者是内在统一的关系。胡锦涛认为“统筹国家资源,兼顾

富国和强军,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通过推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加充裕的物质和技术条件;通过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为国家发展提供更加坚强的安全保障和战略支撑,将富国与强军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根本利益,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19]113}

胡锦涛将国防与经济发展统筹起来,首次提出“军民融合”战略思想,在理论上实现了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发展从或者“军转民”,或者“民参军”单向融合,向经济国防统筹发展的转变。

(二)“国家主导、制度创新、市场运作、军民兼容”的“进阶”时期(2003—2009)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内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国防经费支出受到严重限制。同时,“3·14事件”及境外“藏独”分子和反华势力干扰不断加剧,南海争端再次上演,朝核、南亚等地区热点问题时起时伏。为此,2009年7月24日,胡锦涛在中央政治局全体学习会议上强调,要进一步发挥国防科技工业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促进国防领域和民用领域科技成果、人才、资金、信息等要素交流融合,形成国民经济对国防建设的强大支撑力,国防科技对国民经济尤其是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强大牵引力。强调国民经济的支撑作用与国防科技的牵引作用就是强调在关键时期、困难时期更要加强军民各领域要素的充分融合,发挥“1+1>2”的“溢出效应”。

2011年“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要求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两大建设从国家规划层面上统一起来,标志着中国特色军民融合理论认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十二五”规划提出的新时期军民融合十六字方针是“国家主导、制度创新、市场运作、军民兼容。”国家主导强调我国军民融合已经被纳入国家层面进行统筹规划;制度创新是自主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完善军民融合制度创新,形成全企业、全领域有效竞争与最优产能迫在眉睫,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

力的关键”;市场有效运作旨在通过市场机制,鼓励军工企业与民用企业走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跨国的兼联合之路,形成一大批有实力的大企业、大集团,最终形成经济与国防高度统一、协调发展的军民融合大局观;军民兼容则强调军民融合范围不再停留在军民技术两用层级,更加注重在武器装备、军队人才培养和军队保障等军民融合重点领域和海洋、空天、信息等关键领域进行融合式创新发展,实现更广范围、更深程度、更高层次上的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为了更好地落实这一理念,国防科工委相继颁布《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实施办法》《民用部门军品配套科研生产许可证管理实施细则》等对军民融合产品生产质量、监督、管理标准进行实践支持。

新世纪、新阶段军民融合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逻辑主线,统筹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提出军民融合要进行“民用和国防部门的融合”重要思想。此外,对军民融合的范围进行深入探索,努力把资本、技术、人力资本、设施和信息等一系列促进国防及民用所有可用要素有机结合起来。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存在的体制机制不完善、地方和军队之间进行技术转让受限、知识产权保护力不够,特别是对国防工业原创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在民用和军事领域缺乏普遍的行业和技术标准等问题,军民融合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发展。

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军民融合思想及其实践(2012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把军民融合确立为国家战略,提出构建“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21]151},把军民融合理论与实践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概括起来,新时代军民融合思想及实践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加强军民融合顶层设计,推进军民深度融合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支持军民深度融合,对于解决根深蒂固的体制机制问题、确保充分的资源分配和处理长期的项目管理

问题高度关注。2013年9月,习近平在辽宁省视察“辽宁”号航空母舰和歼-15战斗机研制情况,以及2013年11月视察国防科技大学时先后指出,国防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工作应“紧贴实战,服务部队”^{[22]173},号召人民解放军加强“军事斗争”准备。2014年8月,习近平在主持研究军事创新全球化趋势的政治局全体会议时指出,全球军事科技革命“其速度之快、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影响之大,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所罕见”^{[23]150}。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要求中国国防部门“大力推进军事创新”。2014年12月,在“全军装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肯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发展取得的历史成就,并敦促继续加快新一轮建设步伐。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24]173}。十八届三中全会则进一步将军民融合纳入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三大任务之一。2015年3月12日习近平在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会议时首次提出将“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25]412}。2017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设立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由习近平任主任。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三次提及“军民融合”,“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强化统一领导、顶层设计、改革创新和重大项目落实,深化国防科技工业改革,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26]

(二) 军民融合运行机制全面贯通

一是深化军民融合的国防工业改革进程扎实推进。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对国防工业进行重大改革,此后相继制定了新的中长期国防工业发展战略、规划和制度安排。这些战略、规划和制度安排正在推动中国国防工业从创新跟随者向原始创新领导者转变。2014年3月,中央军委成立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由习近平担任组长,成为设计改革方案、协调各部门工作、执行政策的总指挥。此后举办800多次论坛和讨论会,涉及690个军事单位。经过近两年的调研实践,2015年7月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通过

了《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意见》。2015年11月,中央军委召开改革工作会议,正式启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结构性改革。2015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体系进行了意义深远的重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被重组为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升格到军委一层,负责军队装备体系的“集中统管”,总装备部科学技术委员会被提升到直接向中央军委报告的一级委员会,并更名为中央军委科学技术委员会。

二是军民融合高科技战略计划突破性进展。2017年9月22日审议通过的《“十三五”国防科技工业发展规划》提出了包括推动武器和军事装备的跨越式发展、优化国防工业结构、大力促进军民融合等在内的六项重点任务,标志着国防工业发展的方向从吸收再创新转向更加注重原始创新。为了破解高端制造能力“阿基里斯之踵”,提升国家设备制造基地的整体水平以及减少对外国核心技术和产品的过度依赖,《“十三五”国防科技工业发展规划》与《中国制造2025》,特别是航天和航空计划紧密联系在一起。2015年6月4日,由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牵头,涵盖10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内的国防科技界杰出人物组成的国防科技工业发展战略委员会成立,专注于战略性、全面性和前瞻性的研究,并就国防科技发展和创新等问题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

三是军民融合管理体系“自上而下”全面部署。2017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设立军民融合最高机构——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由习近平任主任,负责军民融合发展重大问题决策和议事协调,是军民融合管理体系的最高领导机构,为全国范围内的军民融合战略贯彻落实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目前正在积极构建中的省市级军民融合领导机构则具有重要的承上启下作用,我国军民融合中央—地方双向互动体制机制以及科研院所、中介机构、金融机构等军民融合服务主体多方参与的机制基本酝酿成熟,目前已经在22个省市认定挂牌了32个国家级军民结合产业基地,20个省份出台了军民融合发展规

划 23 个省市成立了军民融合(结合)工作领导小组,在政策、资金、平台等各个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四川省率先探索地方区域特色军民融合发展路径,初步形成“成都十条”“德阳十二条”、绵阳科技城等初步成果,不仅发挥当地民营企业优势助推军工经济产业链延伸,军工经济也极大地带动了区域经济结构性调整和新旧动能转换,同时为各地方军民融合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北京、成都、邯郸等城市纷纷建立军民融合产业,四川、上海、陕西等省份也已成立了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基金,用于支持军民融合高技术产业发展。至此,“自上而下”的军民融合管理体系国家级层面已经完善,各省市级军民融合管理体系正在积极构建。

(三) 推进军民融合核心技术能力精准突破

新时代军民融合发展更加强调核心技术能力,即“交钥匙技术能力”的突破。当前,我国航空发动机与燃气轮机存在明显的技术瓶颈,大量关键装备、核心技术、高端产品还依赖进口。2018 年 7 月,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7]。2016 年,习近平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我国发展的迫切要求,必须摆在突出位置,同时创新能力也是一支军队的核心竞争力”^{[25]480}。“十三五”规划也对军民融合促进新兴产业发展提出要求,即要“瞄准技术前沿,把握产业变革方向,围绕重点领域,优化政策组合,拓展新兴产业增长空间,抢占未来竞争制高点”^{[25]268}。为加快关键领域的技术创新以及尽快落实影响国家大局和长远发展的重要技术项目在我国落地生根,“十三五”规划将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将创建新的“国家实验室”倡议列为重点项目,旨在建立多学科、大维度的综合集成国家实验室,使之成为具有国际技术制高点的重要战略创新力量。

(四) “产学研”深度整合,军民融合体制机制逐步完善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军工企

业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方面取得很大进展,但隶属于各大军工企业的科研院所受制于“事业单位”的身份,在资产管理、人员安置、收入分配、社会福利、税收和保密等方面存在诸多限制。2016 年,《军工科研院所分类改革方案》《军工科研院所分类改革实施工作方案》《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中军工科研院所转制为企业配套政策》陆续出台,标志军事科研院所改革拉开序幕。军工科研院所的改制将大大激发中国军工行业创新活力,优化资源配置,有利于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和社会资源,提高国家投资效率,促进军民深度融合发展。除军工科研院所体制改革外,中国民间科研机构也在进行全面改革,当前“863 计划”“973 计划”以及由科技部管理的“国家科技基础设施计划”已被整合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技术创新引导基金和人才专项五大计划,着力解决效率低下、信息不透明等结构性问题。2016 年 2 月正式建立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先试先行,是这五大计划中规模最大、最重要的一个,涵盖、研究、开发和生产的所有阶段。

(五) 军民深度融合资本化取得突破性进展

目前,我国的军民融合逐渐从“技术”融合走向“资本”融合并取得突破性进展。例如,在“军转民”方面,通过推进军工企业、军工科研院所股份制改造,整体 IPO 上市或注入已有上市公司资本等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资产证券化等方式实现军用资本民产化;在“民参军”方面,通过收购或兼并现有的军工企业、参与军工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合作组建股份制公司等方式实现民用资本军工化。这些努力大大提升了军工产业与民用产业之间的转化效率,从而更充分发挥前期大量国防建设支出与国民经济建设支出的“外溢效用”。

尽管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军工企业获准在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股市上市子公司,但这仅限于其民用业务。2005 年 2 月国务院颁布《非公经济 36 条》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国防科技工业建设领域。2012 年 6 月国防科工委颁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国防产业的实施意

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国防产业;引导和支持私营资本参与军事企业的重组;鼓励私人资本从事军民两用技术研发。2013年8月颁布《国防科技和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管理办 法》,允许军工企业利用军工资产进行大规模配股证券化。2013年9月中船重工率先从10家中国企业融资85亿元人民币,这对新一代武器装备开发制造以及大规模技术改造产生积极影响。2014年4月颁布《促进军民融合的指导方针》,使得国防工业民营资本准入取得新进展。2016年1月颁布《非国有企业申请军工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有关问题》,概述了非国有企业投资国防工业固定资产的方法。这些政策都是在过去十几年军民融合资本化探索基础上实现的突破性飞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思想是新中国成立70年军民融合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习近平基于世情、国情的变化,以高瞻远瞩的战略家胆识,不断开创出来的强国、强军理论新境界。这一思想将军民深度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是一次重大理论飞跃。在实践层面,设立国家级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清晰地提出“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发展目标,并从军民融合改革改制、技术创新及发展路径、运行体系、融合方式等几个方面理清了新时代军民融合的关键要素,已经在产业领域、科技领域、教育领域、社会服务领域等方面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必将对我国强国、强军目标的实现产生深刻的影响。

七、结 语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的军民融合思想经历一个认识不断深化,实践不断发展的长期过程。改革开放前,毛泽东基于“兵民是胜利之本”的理念,在当时生产力水平极端落后的条件下,以顽强的意志、大无畏的勇气和雄心,在建立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的过程中致力于推进军民融合发展,在路径上既有“军转民”,也有“民参军”,实现了包括“两弹一星”等一系列武器装备的革命性突破,根本摆脱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饱受欺凌的历史,奠定了我国在国际上应有的政治、经济、军事地位,这些是在经济十分落后的条件下

实现的,为在更高层次实现军民融合发展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冷静判断,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十分落后的实际出发,提出并推动了以“军转民”为主要特征的军民融合理论与实践。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军民融合发展的可贵探索,极大地促进了军用技术向民用技术的转变,推动了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为进一步推进军民融合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推动军民融合发展是必须回答的历史性课题。江泽民结合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特征,在坚持“军转民”军民融合基调的同时,提出并推动“民参军”意义上的军民融合。尽管囿于体制机制的障碍,当时不论是“军转民”,还是“民参军”,军民融合发展还只是初步的,但也为后来探索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参照系。进入新世纪,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六位,国际国内形势也发生深刻变化。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推进军民融合发展,需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更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胡锦涛基于科学发展观提出并推动了“军转民”与“民参军”协调推进式的军民融合发展,深化了军民融合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发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一方面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已经成为居世界第二位的经济体,具备了在更好基础、更高水平推进军民融合的条件;另一方面,国际形势波谲云诡,中国面临百年之未有的大变局,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竞争态势更加复杂。如何在强国的同时实现强军,在强军的过程中进一步强国,是新时代军民融合发展的新课题。习近平提出把军民融合发展道路上升为国家战略,并高度重视军民融合的顶层设计、制度安排、体制架构、机制创新,探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军转民”与“民参军”、军民深度融合的新的有效途径,实现强国与强军有机结合、内在统一。这一探索与新中国成立以来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探索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我国军民融合理论进入了全新境界,实践发展进入了全新阶段。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 [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 [4] 《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 [5]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 [6]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 [7] 杜辉《协调发展:国防与经济建设内在规律的科学总结》,《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 [8]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 [9]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 [10]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 [11] 《邓小平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论述选编》,北京:八一出版社1993年版。
- [12] 《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 [13] 《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 [14] 姚延进、刘继贤《江泽民军队建设论述研究》,济南:黄河出版社1998年版。
- [15] 《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 [16] 《论国防和军队建设》,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
- [17]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 [18]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 [19] 《国防和军队建设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选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0年版。
- [20]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 [21] 《习近平在接见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的讲话》,《中国军民融合发展报告》,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 [22] 习近平《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 [23]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 [24] 《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 [2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
- [26]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7日。
- [27]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人民日报》2018年7月14日。

[责任编辑:曾博]

ABSTRACTS

Modernization: 70 years of Unremitting Exploration and Glorious History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BAO Xin-jian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University of Jinan, Jinan 250022, China)

Abstract: Modernization is the goal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Chinese people who have been struggling to explore and striving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ho is seeking happiness for the Chinese people and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the mission, has established an inextricable relationship with modernization and worked hard to realize modernizati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epresented by Mao Zedong, clearly put forward the great program of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and opened up a new era to realize China’s modernization based on the socialist system and self-reliance, which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true “standing-up”.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epresented by Deng Xiaoping, clearly put forward the great goal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nd opened up another new era to realize China’s modernization through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Three-step” strategies, which established a bright road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Chinese people “growing rich”.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epresented by Xi Jinping, clearly proposed the great strategy of “moving on to all-out efforts to build a great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and achieved a new era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in terms of the five-sphere integrated plan and the four-pronged comprehensive strategy, which made the Chinese nation achieve a tremendous transformation: it has stood up, grown rich, and is becoming strong.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is the great long march that generations of Chinese Communists lead the Chinese people to continue their struggle. The Contemporary China’s new long march of “moving on to all-out efforts to build a great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deeply embodies the great logic of and the great direction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nd clearly demonstrates the political wisdom and mission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Communists represented by Xi Jinping.

Key words: Four Modernization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Building a Great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The Evolution of the Thought of Military-Civil Integration and its Practical Path Since the Founding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XIE Di^{a, b}, RONG Ying^a

(a. School of Economics; b. Research Center for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01136,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ilitary-civil integra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eatures in the road of economic growt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m. On the occasion of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reviewing the evolution and prac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thought of military-civil integration has undoubtedly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profoundly understanding the path of the military-civil integr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plor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hinese dream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strong military, striving to optimize the economic structure, transform and upgrade through military-civil integration,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y, and achieving goals of building strong military. The thought of the military-civil integration, whose development is both continuous and advancing with times, mainly comes from the top leaders of the Party and our country. Particularly, sinc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ered the new era, the thought of military-civil integration has become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our country and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development pat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new era, which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our country’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Development Pat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ilitary-Civil Integration; National Defense Construction; Economic Construction

[英文编校: 宋琳琳]

· 本刊中青年作者简介 ·



谢 地 1963 年生，吉林农安人，经济学博士，辽宁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教育部新世纪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兼任中国政治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领导小组成员、世界政治经济学会理事、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常务理事等。主要从事政治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研究，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求是》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近 200 篇，出版教材、著作等 20 余部。2016 年 7 月 8 日，应邀出席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并作为东北学者代表就“东北振兴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发言，得到肯定。在本刊发表的论文有：《防范中国公共债务风险研究》（2013 年第 8 期）、《基于产业组织视角的产能过剩治理研究》（2015 年第 7 期）、《新中国 70 年军民融合思想演进与实践轨迹》（2019 年第 6 期）。

赵 磊 1977 年生，山西阳泉人，法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关系与“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中央党校创新工程首席专家，“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教育部“国别与区域研究专家委员会”委员，商务部“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专家组专家，《丝路瞭望》杂志专家委员会主任。主要从事国际关系、中国外交、多边外交与文化软实力、民族冲突管理、“一带一路”建设等领域的研究。主持并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各 1 项；出版《文化经济学的“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中国的文明型崛起》等学术专著；在《美国研究》《外交评论》《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其中 10 余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在本刊发表的论文有：《“一带一路”建设与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兼论新疆的发展机遇与实践》（2019 年第 5 期）。

